

地震纪念性景观

对震区地方感建构的影响研究

MEMORIAL LANDSCAPES
OF EARTHQUAKE: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PLACE

唐 勇 等 著

2008·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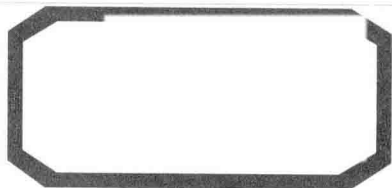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2016年度项目专项成果 (SC16B006)

国家留学基金 (201908510015)

成都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发展资助计划 (10912-2019JX52-00940)



地震纪念性景观

对震区地方感建构的影响研究

MEMORIAL LANDSCAPES
OF EARTHQUAKE: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SENSE OF PLACE

唐 勇 王尧树 傅滢滢 钟美玲 / 著
向凌潇 刘雨轩 秦宏瑶 曾祥裕



四川大学出版社

项目策划: 唐 飞
责任编辑: 唐 飞
责任校对: 蒋 琦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 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震纪念性景观对震区地方感建构的影响研究 / 唐勇等著.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690-2913-0

I. ①地… II. ①唐… III. ①地震灾害—纪念建筑—景观规划—研究—汶川县 IV. ① TU984.1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4629 号

书名 地震纪念性景观对震区地方感建构的影响研究

DIZHEN JINIANXING JINGGUAN DUI ZHENQU DIFANGGAN JIANGOU DE YINGXIANG YANJIU

著 者	唐 勇 王尧树 傅滢滢 钟美玲 向凌潇 刘雨轩 秦宏瑶 曾祥裕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913-0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扫码加入读者圈

- ◆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6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序 言

汶川地震十周年，如何重新审视和反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生产与灾区地方的关系，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命题。本书关注灾变下的地方毁灭与重构，其研究对象与内容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以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为研究对象，分析以它们为核心的地方与空间问题；其次是分别从“游客凝视”与汶川地震灾区幸存者这两个关键性视角，考察地方感、人类空间体验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地震纪念性景观对于地方感建构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研究难点在于从灾区地震纪念性空间与公共游憩空间以及活动空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地震纪念性景观如何引导感知，审视空间中人的态度与行为。作为跨学科研究，它涉及行为地理学、景观学、旅游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

本书综合运用案例研究、问卷调查、扎根理论等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采用 IBM SPSS、SPSS Amos、ArcGIS 分析工具，通过地方考察、科学计量、生活体验等方式进行研究，包括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生产、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系统、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分布、汶川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认知、地震纪念性景观知觉对灾区地方感的影响 5 个主要部分。相对于已有研究，其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景观学与地理学的多元联结视为以意义、理解和主体间性等重要范畴为支撑和指向的关系，将研究视野拓展到空间生产、灾难记忆图式及其与地方性的密切关系上，提出将汶川地震纪念地的黑色旅游活动视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一种特殊的纪念形式与活动，理解为新的“纪念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发明，由此步入灾难地理学研究的新视域。第二，力求体现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具备研究内容的交叉和融合，尝试与地理学空间思想的转变，以及空间现象学等作对接，试图提供一个综合的理论图景。同时，考虑地震纪念性景观对居住环境、社会心理所具有

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从汶川地震幸存者(灾区居民)和前往震区的外地游客双重视角设计全新量表,测量景观知觉、地方感等多维度特征,属于原创研究。第三,反思地震纪念性景观的空间生产和灾区居民与游客的关系,积极响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望为灾后重建区迫在眉睫的空间冲突、地方错置等问题的解决做出新贡献,对理想的灾后地方性空间规划和灾区复兴有一定的探索意义,特别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纪念性景观空间生产,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本书选题可追溯到我在博士期间的学习与研究经历。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我一直从事地震纪念性景观与游客认知行为相关的研究工作。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龙门山地震地质遗迹景观体系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及同名专著对本书的部分基础性科学问题进行了探索。一方面,从景观地学的角度,关注地震灾害的直接衍生物——地震地质遗迹景观的成因、演化、特征、类型等基础性科学问题;另一方面,从资源利用的视角,尝试探讨灾区地震地质遗迹景观的旅游开发利用等现实层面的问题。

本书选题可归入灾难地理学这一充满挑战的交叉研究领域。引领我步入这一领域者当属康涅狄格大学地理系肯尼斯·富特(Kenneth E. Foote)教授。富特教授惠允我翻译出版他在灾难地理学领域的重要著作《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难景观》(*Shadowed Ground: America's Landscapes of Violence and Tragedy*)。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第2章的写作风格深受该书的影响。2012年12月至2014年1月,我有幸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与康涅狄格大学地理系访学,在富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灾后旅游目的地感知意向与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研究。随之,我发表了一些可视作为本书前期探索性研究的成果。例如,“Travel Motivation, Destination Image and Visitor Satisfaction of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fter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揭示了汶川地震之后赴川入境游客的动机、目的地形象感知与满意度之间的认知结构关系;“Dark Touristic Perception: Motivation, Experience and Benefits Interpreted from the Visit to Seismic Memorial Sites in Sichuan”密切关注游客对于地震纪念地的基本态度,揭示出游动机、游览体验与游后价值评价及其之间的认知结构关系,提出了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活动的理论框架。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地理系鲁迪·哈特曼(Rudi Hartmann)

教授鼓励我从事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研究，并邀请我参编由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的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Dark Tourism Studies*（《黑色旅游研究指南》）（Stone, et al, 2017）。我对该书的微薄贡献是完成了第四部分“Dark tourism and heritage landscapes”（黑色旅游与遗产景观）第十八章“Dark tourism to seismic memorial sites”（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Tang, 2018b）。哈特曼教授让我认识到黑色旅游研究是人文地理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领域，而汶川地震纪念地旅游活动研究方兴未艾。这一认识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予以强化。2013年至2018年期间，我携与本书相关的研究成果，先后于 University of Denver（Colloquium）、Young Scientists Networking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Science（Poster session）、2015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2016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第33届国际地理大会、2017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等会议上作特邀学术报告、交流。

我要特别感谢在美国访学期间的同窗好友——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地理系杨洋博士、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地理系盖伦·马特（Galen Murton）副教授。本书的研究问题始于与杨洋博士、盖伦副教授的讨论。正是与他们的愉快切磋与相互砥砺，让我开始深入思考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生产与灾区地方的关系，特别是重大地震灾害对人地关系的调整引发了对灾难记忆如何进入历史叙述、折射出怎样的人性与现实的理性反思。

本书受益于前期探索性研究，但不是论文成果的汇编，而是前期工作的深入和延续，在科学问题和应用范围等领域有实质性提升。本书的依托项目是“地震纪念性景观对震区地方感建构的影响研究”分别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项目（SC16B006）、国家留学基金（201908510015）及成都理工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发展资助计划（10912—2019JX52—00940）共同资助。此外，四川景观与游憩研究中心一般项目——地震纪念性景观的游憩价值与地方感特征研究（JGYQ2015018）和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汶川地震纪念地游客动机、体验与价值认知研究（2016JGX09），均是由我主持的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前期探索性研究。

本书写作历时3年有余，主要是我与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王尧树、傅滢滢、钟美玲、向凌潇、刘雨轩几位硕士研究生协同攻关、集体智慧的结果。第1章绪论由唐勇、王尧树负责；第2章汶川地震纪念

性景观空间生产由唐勇、曾祥裕、秦宏瑶负责；第3章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系统由傅滢滢、王尧树负责；第4章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分布由王尧树、钟美玲、唐勇负责；第5章汶川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认知由唐勇、向凌潇、钟美玲、刘雨轩负责；第6章地震纪念性景观知觉对灾区地方感的影响由唐勇、傅滢滢、王尧树负责。全书参考文献主要由傅滢滢负责整理，由曾祥裕负责统稿。刘学、薛广召、毛爽、杨悦、李晓强等硕士研究生参与了调研、访谈等田野工作。富特教授、张雪娟、柳柚伊、何明富等同仁为本书提供了部分照片。作者在此并致谢忱。

时间仓促，视野局限，难免错漏，敬请斧正，不胜感激。

唐 勇

2019年5月于成都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2 理论基础	(4)
1.3 研究内容与目的	(14)
1.4 研究对象与方法	(14)
1.5 重点难点与创新	(15)
第 2 章 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生产	(17)
2.1 灾后重建中的地震纪念性景观	(18)
2.2 地震纪念地的黑色旅游之争	(21)
2.3 汶川地震后的灾害记忆图式	(24)
2.4 本章小结	(27)
第 3 章 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系统	(29)
3.1 类型划分	(30)
3.2 宏观尺度	(32)
3.3 中观尺度	(48)
3.4 微观尺度	(61)
3.5 本章小结	(73)
第 4 章 汶川地震纪念性景观空间分布	(76)
4.1 研究方法	(77)
4.2 研究结果	(78)
4.3 本章小结	(83)
第 5 章 汶川地震纪念地黑色旅游认知	(85)
5.1 纪念地旅游活动	(86)

5.2	研究设计	(88)
5.3	研究结果	(90)
5.4	本章小结	(94)
第 6 章	地震纪念性景观知觉对灾区地方感的影响.....	(96)
6.1	研究设计	(97)
6.2	景观知觉	(107)
6.3	地方感	(115)
6.4	迁居意愿	(124)
6.5	认知结构关系	(133)
6.6	本章小结	(141)
第 7 章	结论与讨论.....	(144)
参考文献		(148)
附 录		(176)
附录 1	地震纪念性景观基础数据表	(176)
附录 2	地震遗迹景观与旅游行为关系调研问卷	(191)
附录 3	地震纪念性景观与震区地方感调研(游客问卷)	(195)
附录 4	地震纪念性景观与震区地方感调研(居民问卷)	(199)
附录 5	灾区居民最优模型路径系数估计	(202)

第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灾难遗址之所以能够成为纪念地是因为它们大多见证了一国、一城、一地的某个重要历史时刻。近年来,新西兰霍克湾地震纪念墓园、中国台湾“9·21”地震纪念园、日本阪神大地震纪念园、泰国印度洋海啸纪念园、唐山地震遗址公园等地震灾区场域中关于纪念性景观与地方性关系问题的争论,逐渐成为游憩地理学、环境心理学、行为地理学、建筑叙事学,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共同关注的前沿研究领域(Chen, Xu, 2018; Foote, 2003; Martini, Minca, 2018; Ryan, Foote, Azaryahu, 2016; Zhang, 2013; 段禹农, 等, 2016)。一方面,地震纪念性景观及其营造的纪念性空间与存在空间、行为空间相互叠加,既能引起情感共鸣,也可能由于空间冲突、失语、屏蔽、压缩引发地方错置与窥视剧场的伦理关切(Biran, et al, 2014; Qian, et al, 2017; Rittichainuwat, 2008; Ryan, Hsu, 2011; Tang, 2014a, 2018b; Yan, et al, 2016; 王金伟, 张赛茵, 2016; 颜丙金, 等, 2016);另一方面,对于地震纪念性景观,抑或“死亡景观”(Death-scape)、“恐怖景观”(Landscape of fear)的情感体验,既有基于正面情感联结的地方感,也可出现疏离感、焦虑感、恐惧感、耻辱感、风险感知等负面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特征(Relph, 1976; Tuan, 1979)。在此背景下,审视地震纪念性景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命题(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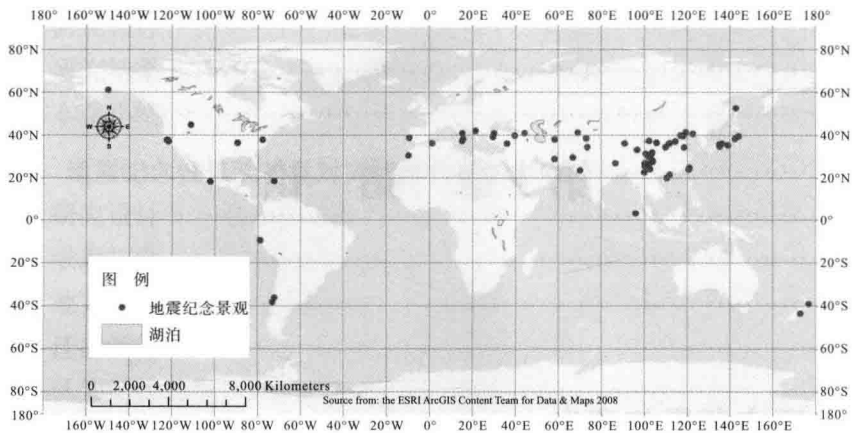


图 1-1 全球典型地震纪念性景观分布图

汶川地震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呈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萧延中，等，2009；黄承伟，赵旭东，2010），也为了解地震纪念性景观对于灾区地方感建构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龙门山地震带发生了汶川 Ms8.0 级地震，仪器震中位于映秀镇（31°00'N，103°24'E）。汶川大地震主要是沿映秀—北川断裂和灌县—江油断裂发生的逆冲兼右旋走滑破裂事件（Parker, et al, 2011；Wang, et al, 2008；王卫民，等，2008）。此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最强、灾害最重、救灾难度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特大地震（邹和平，等，2009）。汶川地震主震区地质构造复杂，断裂发育，加之地震烈度高、震源浅，触发了大量滑坡、崩塌、碎屑流、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造成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人员和财物遭受巨大损失（Huang, Chen, Liu, 2012；Svirchev, et al, 2011）。地震波辐射半径 2000 km，灾区涉及四川、甘肃、陕西等 10 个省区市的 417 个县，受灾面积 $4.1 \times 10^5 \text{ km}^2$ ，受灾人口 4625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 8451 亿元人民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08）。截至 2008 年 8 月 25 日，地震共造成 69227 人死亡，374643 人受伤，17923 人失踪（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08）（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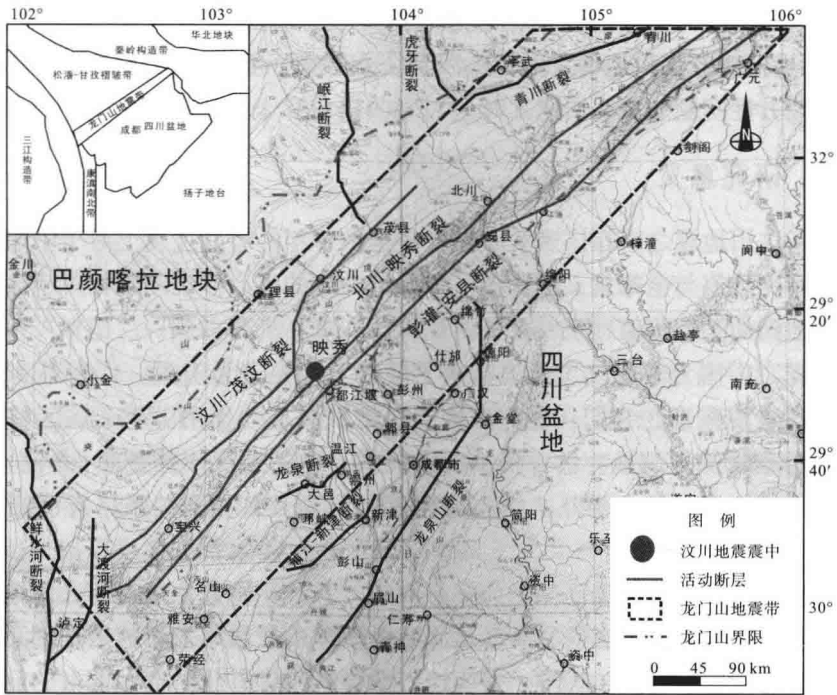


图 1-2 龙门山地震带与龙门山脉及四川盆地构造位置关系图 (唐勇, 2012)

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时期, 不论是国务院还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所发布的规划、条例均指出, “保留必要的地震遗址、建设充分体现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纪念设施的重要目的在于宣扬抗震救灾中激发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精神家园的重建”。事实上, 灾后恢复重建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地震遗址保护的初衷, 而是逐渐将其视为地震遗迹旅游或地震专题旅游, 特别是地震纪念遗址黑色旅游活动的核心吸引物 (Yang, 2008; Yang, Wang, Chen, 2011; 唐勇, 等, 2010, 2011, 2012, 2014; 王金伟, 王士君, 2010)。然而, 不论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令 526 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国发〔2008〕31 号)、《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22 号), 还是 2009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北川、映秀、汉旺、深溪沟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及博物馆建设项目规划》, 均没有明确提出将地震遗址作为旅游资源予以开发利用的指导性意见 (彭晋川, 陈维锋, 2008; 阚兴龙, 李辉, 周永章, 2008)。

2018 年, 迎来了汶川地震十周年, 以关注人类共同命运、携手应对自然

灾害为主题的“汶川地震十周年记忆图片展”在欧盟议会举行（韩基韬，2018），这标志着汶川地震之殇再次回到公众视野，重新审视地震纪念性景观与灾区地方性问题的关系恰逢其时。

1.1.2 研究意义

基于汶川地震之殇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尺度上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价值与全球意义的认识，本书所关注的核心科学问题相对于已有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为纪念汶川地震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纪念性景观体系，它们在地方建构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基于震区特殊场域，探讨景观知觉与地方性，揭示人地关系，本书所提出的创新性科学问题对认识景观知觉、地方感、人类空间体验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将有清晰的新贡献。

其次，地震纪念性景观知觉为核心的地方感特征研究，是近期人文地理学所提倡的研究方向。现有研究主要从旅游地理学、景观地理学的角度展开，尚未与环境心理学、行为地理学、灾害地理学等学科作充分对接。本书的前瞻性与学科交叉性突出，有望在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

最后，大震以后地方重建，为纪念性景观与震区地方性问题研究提供了良好实验场所。汶川地震十周年，反思地震纪念性景观知觉、地方感特征及其与迁居意愿的关系，有望为规划建设理想的灾后地方性空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与借鉴，从而将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引入对策分析的现实层面，由此凸显巨大的现实意义。

1.2 理论基础

“景观”（Landscape）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也是解读气候变迁、环境退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问题的重要视角。人们通过塑造景观来实现与未来沟通的目的，景观的符号体系、象征体系将帮助人们实现跨越时空阻隔的交流。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有诸如宗教仪式、口头传承等多种保存共同的价值观、信仰的方式，但是景观类似于文字记载，是一种能够长时间存留的视觉表现形式，其特色鲜明、优势突出（Foote, 2003）。纪念性景观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其地方、空间问题是游憩地理学、环境心理学、行为地理学、建筑叙事学，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热点领域（Antrop, 2013）。本节聚焦于地震灾

难之后涌现出的纪念性景观,并以此为切入点,回溯前人在纪念性景观(Memorial landscape)、黑色旅游(Dark tourism)、地方感(Sense of place)等不同概念之下所作的若干有价值的探讨。

1.2.1 纪念性景观

1.2.1.1 纪念性景观分类

从“地理”一词的语源上讲,景观无疑是“大地之痕”(Earth writing)(Foote, 2003)。依托景观这个“容器”将人类记忆、文化精神等抽象物质载入其中,从而产生具有纪念行为的“活体”景观——纪念性景观(Memorial landscape),这更像是人类的专利(李开然, 2005)。从游憩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王欣等(2010)认为,纪念性景观是以纪念人和事为目的建造的、以供人们回忆或铭记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实际上,纪念性景观既可以是游憩学所谓的“游憩境域”,也可能是地理学所关注的纪念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的“场所”(方远平,唐艳春,赖慧珍, 2018),还可能是建筑学所认为的有形或无形的“纪念形式”(赵凯,唐晶,郑东军, 2013),或者说是景观学意义上的物质性或抽象性景观(李开然, 2008; 刘滨谊,姜珊, 2012)。

国内对于纪念性景观的类型学研究积累了较多前期成果,但标准和方案尚存争议(刘滨谊,李开然, 2003; 李彦辉,朱竑, 2012)。从纪念对象的角度出发,分为纪念人物型景观、纪念事件型景观、综合性纪念性景观;按照纪念性景观的选址差异,又可以分为遗址类纪念性景观、非遗址类纪念性景观及综合性纪念性景观(王欣,谢雄,王崑, 2010)。依照纪念性景观形成过程,刘滨谊等(2012)尝试将初始—二次承载型(刘滨谊,李开然, 2003)与主动—被动型(李开然, 2008)组合为4种基本类型:主动性初次承载型、被动性初次承载型、主动性二次承载型、被动性二次承载型,涵盖牌坊、纪念碑、纪念地、陵墓等不同类型及空间尺度的纪念性景观。

国外对纪念性景观的类型学研究似乎不是特别关注,而是侧重于相关案例研究。例如,“9·11”国家纪念馆记忆与体验(Baptist, 2015),纪念碑与纪念馆(Alderman, Dwyer, 2009),堪培拉纪念性景观规划(Stevens, 2013)等。从案例的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李彦辉, 2012):战争(Packer, Ballantyne, Uzzell, 2019)、纳粹屠犹(Charlesworth, 1994)、政治运动(Alderman, 2000)、中东欧(Burnett, 2005)。美国通过国会对纪念

性景观进行命名和授权,形成由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的“国家纪念景观”(National memorial)体系,包括战争遗址地、灾难原址、纪念碑、纪念园、纪念建筑等30处。

中国国家级纪念性景观体量较大,但主要以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抗战纪念设施与遗址名录等红色纪念性景观为主(李珊珊,2006;张红卫,张睿,2016)。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定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1976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建设毛主席纪念堂;2014年9月1日,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2015年8月24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1.2.1.2 纪念性景观表达

中西方纪念性景观在象征、隐喻等手法的使用上相互借鉴,成果颇丰(张云,2009;李彦辉,朱竑,2012;刘玲,许自力,2017;王冬青,2005;张红卫,王向荣,2010;何疏悦,王春芳,季建乐,2014)。景观学按照表达形式的不同,将其归纳为保留复原法、阐释叙述法、重构更新法、强化渲染法和象征隐喻法等手法(王欣,谢雄,王崑,2010)。建筑学从设计视角出发,分为象征、叙述、再现、隐喻等手法(赵凯,唐晶,郑东军,2013)。借鉴叙事学理论,李方正等(2013)提出场景再现、隐喻、象征、留白、对比等手法。

纪念性景观在视觉表达效果与植物景观营造策略的研究,开启了纪念性景观表达的新视角(武小慧,2004;刘滨谊,姜珊,2012;欧阳桦,杨婷婷,2013;杜辉,2016)。武小慧(2004)以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区为案例,对其丰富的植物景观进行研究,发现植物景观可以更加突出景观的纪念性。欧阳桦等(2013)以重庆市忠县将军林为案例,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但与武小慧的研究相比,更深入地研究了纪念性空间中的植物景观的营造策略。赵纪军等(2011)以武汉首义公园为案例,通过回顾近百年来首义公园中的各种纪念性表现,研究了从园林到景观纪念性的发展规律。方叶林(2013)和杜若菲(2016)等以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馆和纪念碑为案例,研究了战争纪念馆游客旅游动机对体验的影响和战争遗址纪念碑的价值评价。王越(2017)以周恩来同志故居为案例,进行了纪念地与纪念性博物馆比较的研究。

从地理学的角度对纪念性景观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景观的集体记忆方面,尤

其是城市集体记忆。“人文地理学者在考察和解释纪念性景观时强调空间的意义,以建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分析纪念性景观的社会和空间过程以及纪念性空间的开放性、象征性和竞争性”(李彦辉,朱竑,2012; Alderman, 2000; Dwyer, Alderman, 2008; Foote, 2003; Lowenthal, 1975; Tuan, 1974)。例如,李彦辉等(2013)以黄埔军校旧址为案例,研究了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周玮等(2014)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案例,从城市记忆的文化旅游地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游后感知维度分异。汪芳等(2015)以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案例,研究了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侍非等(2015)以南京大学校庆典礼为例,研究了集体记忆和象征空间的建构过程及其机制。近年来,地理学以空间叙事理论为指导,聚焦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地等不同空间尺度下纪念性景观叙事类型与策略,丰富了纪念性景观主题与思想表达的基础理论(Alderman, 2009; Azaryahu, Foote, 2008; 侍非,等,2014)。例如,Ryan等(2016)提出了点叙事、时序叙事、复杂叙事、混合叙事四种策略。

1.2.1.3 纪念性景观感知

近年来,景观价值或意义与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研究问题(Brown, Raymond, Corcoran, 2015; Fishwick, Vining, 1992; Kaltenborn, Bjerke, 2002)。例如,从居民、旅游者或游憩者的视角,研究文化景观(唐文跃,2011;邱慧,等,2012;李凡,朱竑,黄维,2010;张敏,汪芳,2013)、遗产景观(郑群明,等,2014;苏勤,钱树伟,2012)与地方感之间的关系。此外,书法景观作为中国传统特色的纪念性景观,是具有国际对话潜力的领域(张捷,等,2012,2014; Zhang, et al, 2008, 2012; Zhou, Zhang, Edelman, 2013)。然而,相关实证案例集中于战争、种族屠杀等“人祸”,而对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关注不足(White, Frew, 2013)。例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址、安大略省监狱博物馆等(方叶林,等,2013;左冰,周东营,2014;冯淑华,2008; Dunkley, Morgan, Westwood, 2011; Winter, 2011; Belhassen Caton, Stewart, 2008; Walby, Piche, 2011)。

围绕纪念性景观的动机、体验与景观知觉具有多维度特征(Cohen, 2011; Hughes, 2008; Bigley, et al, 2010; Strange, Kempa, 2003)。然而,缅怀逝者或对死亡景观(Death-scape)的“好奇”在旅游决策中的作用孰重孰轻(Hartmann, 2014)?再如,纪念地之旅能够让人有所收获或产生多

方面的游后价值认知 (Kang, et al, 2012; Cohen, 2011)。虽然景观可能有美感、经济、游憩等正面价值,但“死亡景观”却可能对居住环境、社会心理等产生负面影响 (Brown, et al, 2009, 2015; White, Frew, 2013)。鉴于景观价值的矛盾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纪念性景观的空间效应对于地方感建构的作用与意义?

纪念性景观与集体记忆、地方感等关系密切 (Graham, Ashworth, Tunbridge, 2008)。《遗产、记忆与自我认知:文化景观新视角》肯定了遗产景观对于集体记忆及地方认同形成的作用 (Moore, Polley, 2007)。《灰色大地——美国灾难与灾害景观》以及《重塑美利坚:二十世纪的公众记忆、纪念活动与爱国运动》关注灾难记忆、纪念活动及景观如何促成新的纪念传统的产生 (Foote, 2003; Bodnar, 1992)。然而,由于综合因素对于记忆空间的作用,地震纪念性景观中的社会记忆出现选择性与倾向性,景观的空间分配不平,高风险区域的地方依恋受制于“空间维度折扣效应” (Billig, 2006)。由此,环境补偿、房租水平、不动产价格等指标反映出景观空间效应对于地方感的影响 (Hannon, 1994; Devine-Wright, Howes, 2010)。那么,后汶川地震时期,地震纪念性景观发挥了怎样的空间效应?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感,进而强化了国家认同?

除少数地震、洪水等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具有缅怀逝者、警示后人等突出作用而被“记住”,大多由于伤亡惨重且缺乏必要的“意义”或“价值”被“遗忘” (Foote, 2003; Frost, Laing, 2013)。Lowenthal (1975)指出,与荣耀关联的景观通常免受破坏,但背负耻辱者往往被擦除。Foote (2003)将公众对灾难事件的响应归纳为公众祭奠、立碑纪念、遗址利用与记忆湮灭四种相互联系并转化的形式。因此,地震纪念碑、纪念广场、博物馆等不同空间尺度的纪念性景观,成为公众祭奠的重要空间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前期研究中,我们从游客视角,初步探测了游览体验在变量间的中介作用 (Tang, 2014a)。然而,当地居民如何看待地震纪念性景观,尚不可知 (Kianicka, et al, 2006)。

1.2.2 黑色旅游

1.2.2.1 黑色旅游动机

“黑色旅游” (Lennon, Foley, 2000) 又称为“死亡旅游” (Thanatourism) (Seaton, 1999)。此概念涵盖“暴力遗产旅游” (Atrocity heritage tourism) 及